

武则天撰写的《臣轨》是一部内涵丰富的著作，涵盖了为臣之人如何尽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等内容。其中,《臣轨·至忠章》中体现出的忠诚为国思想值得品味和研究。其中提到了两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曰尽心尽力，二曰发奋自省。这两条标准在一些名臣循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尽心尽力

《臣轨·至忠章》中说：“盖闻古之忠臣事其君也，尽心焉，尽力焉。”尽心尽力是忠臣的鲜明底色和职责所在。

尽心尽力的第一层意思是上级交给的任务能够脚踏实地加以完成。东汉名臣孔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尽心尽力。西汉末年，战乱四起，孔奋担任河西地区姑藏的行政长官。因为姑藏比较安定，“称为富邑”，所以担任过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官员不用太长时间就会积累起大量的私人财富。在这里任职的孔奋，尽职尽责，“治贵仁平”，施政以仁义平和为本，而且他为官清廉，得到百姓的赞赏和认可。入京之后的孔奋，被授予武都郡丞一职。当时陇西残余贼人深夜袭击武都并且残杀了武都太守。贼人害怕孔奋紧追不舍，于是抓住孔奋的妻子儿女为人质。当时年已五十的孔奋，“终不顾望”“遂努力讨之”，最后讨伐成功，被任命为武都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孔奋每任职一个地方，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尽心尽力的第二层意思是自己能力出众，超额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明宣宗时期，承平日久，府衙百弊滋生，需要任用廉政且有能力的

官员去收拾这个局面。在京为官的况钟经人举荐，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地区赋役繁重，豪强猾吏舞弊弄墨以奸求利，有“最号难治”之称。上任之后的况钟抓住属僚中贪赃暴虐之徒违法事实进行处理，“一府大震，皆奉法”。完成朝廷派他到苏州任职整顿吏治的任务后，他本可以因规办事、按矩处世，但是过人的能力匹配忠诚的心灵，让他上演了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一连串好戏。他上奏希望免除苏州繁重的赋役，明宣宗都予以批准。况钟还注重制度建设，通过设置簿籍记录乡民善恶；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奸作伪；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没。此外，况钟打出了铲除豪强、扶植良善的组合拳，当地风气为之一变。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况钟自热赢得百姓爱戴。在苏州知府任上，况钟要为去世的母亲服丧，当地百姓前往朝廷请求他留任，朝廷下诏，让他戴孝起复留任。况钟在苏州任职期限已满，本应提拔，当地百姓请求况钟继续在苏州任职，明英宗下诏，为况钟提薪，“食正三品俸禄”，仍然留任苏州知府。况钟后来逝于苏州知府任上，当地百姓非常痛惜，“吏民聚哭，为立祠”。

尽心尽力的第三层意思是甘冒一定风险，为了特定的使命，通过谏言力行的方式，说服上级和群众，以实现某种工作安排与计划。对待上级，

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是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推翻的。相反，来自陆疆，尤其是北部边疆的强敌外患，却几乎无朝无之，所以“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清廷入关以后，世界格局已变，清王朝在海陆两方面同时遇到新的对手。

清朝前期的治边重点仍在西北，其内容和性质却与前朝根本不同。随着清代社会持续变化和西力东渐趋势的增强，东南海疆风起云涌，万象纷呈，其复杂深刻的连番动荡，更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

“陆疆”“海疆”孰轻孰重？

清代海疆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人口构成、交通建置、国际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各方面与陆疆截然不同，故其管治政策包含的内容亦大不一样。粗略分之，似有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上包括海禁政策、移民政策、海岛政策（主要是治台与治琼政策）、海疆民族政策以及治安保甲、海上交通制度等；军事上包括沿海内外防御政策、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与管理、海上巡哨制等；经济上包括海内对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对外关系则包括外交政策（含海外属国政策）、禁烟、禁教以及一系列限制外人的政策法规等。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海疆政策既有庞杂的内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策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多数是民族地区，清廷的治理对象除极少数国外入境商民外，绝大部分为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外，更多是汉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对汉人与洋人又各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防备不法

也。故分官列职，各守其位，处其任者，必荷其忧。臣之与主，同体合用。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亦如手之系身。上下协心，以理国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亲，则君臣之道著也。

盖闻古之忠臣，事其君也，尽心焉，尽力焉。称材居位，称能受禄。不面誉以求亲，不愉悦以苟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人。内匡君之过，外扬君之美。不以邪损正，不为私害公。见善行之如不及，见贤举之如不逮。竭力尽劳，而不望其报；程功积事，而不求其赏。务有益于国，务有益于人。

谏言之策会因有识的领导而被采纳；对待群众，谏言之策也会因为言之有理、行之有道而被采纳。明代有一个官吏叫唐侃，来到江西永丰县任职。当时永丰百姓有三个喜好：“喜刁诮”

“尚鬼祀”“好俳优”。于是他做百姓思想工作：“此大蠢也。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唐侃辅以刑罚震慑，他在官署立了两块木牌，左边写的是“从刑”，右边写的是“从化”，百姓经过长时间

中华春秋

清代海疆政策的得与失

马大正 何瑜



之人潜聚台湾，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自乾隆朝起及以后，则主要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备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其次，清代腹地边疆，朝廷有专门机构理藩院管理，体制甚隆，权不外假，从来治边大政，未曾付诸宗室以外的汉蒙回藏各族。但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无“藩”可理，且海战为八旗兵所短，万里海疆清廷一无专门机构，二无嫡系之旅，不得不依赖督抚，委之汉人，所以防范限制政策十分突出，这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二字上。如台湾统一前，有“禁海迁界”政策、边禁政策以及沿海商民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等。

另外，清代海疆地区除渔、林、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且治理对象亦是以汉人和洋人为主，故其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集权化和中国化，而不是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传统汉人社会的“道一风同”。

“善筹边者，却敌而已”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的海疆政策形成稍晚，约在顺治、康熙两朝。此时，近代以前的清廷海疆政策，如有清一代“以汉治海”的沿海防御体系，以“为防台而治台”的治台政策，以及海关制度、海内外贸易政策、海疆民族政策、海上治安与交通制度，还有对外限制防范的一系列政策等，均已大体形成。

随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布“开海贸易”以及随后中外交往的日趋密切，中国海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与此相应，雍乾两朝清廷的海疆政策亦逐步完善和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内八旗水师的创办，水陆联汛联保制度的最终形成，公行制度的建立，南洋政策的发展以及治台政策的完善等。对外则是强化澳门管理，推行“一口通商”以及管理外商等一系列严密措施。

回顾清代海疆政策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除受内部环境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制约。乾隆朝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侵华步伐，清廷海疆政策不得不随之逐步调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廷整个治边政策呈现两大明显转折：一是治边重心逐步从陆疆转向海疆，二是海疆政策对内日渐松弛，对外则日趋强化。这是西北陆疆巩固之后，清王朝治边战略的第二次大转移。到近代以后，列强海陆并进，而海更急于陆，清廷的海疆政策又进入了一个御侮救亡的新阶段。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

护其长久的统治利益，在治边政策上不仅集传统王朝之大成，而且因时因地制宜多有发挥。但其在积极吸取汉族文化的同时，亦受到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形成既有少数民族特色，又体现儒家治国方略的边疆政策。如不管是陆疆还是海疆，清朝都是在积极进取之后巩固防守，而不是漫无约束地扩张领土，充分体现了“天子守在四夷”这一经典信条。

清入关以后，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中国海疆环境已发生历史性巨变，但以自我为中心的闭关自守，仍然是清代边疆政策的不变原则，在海疆政策上表现尤为明显。这种“以守为主”的治边政策，完全以政治为出发点，其目标在“宁辑边疆，相安为用”，以海岛、藩属为屏障，最终达到拱卫京师、维护中央王朝之目的。因此，它对周边藩属的要求是“不侵不叛”，经济上并不求其土地财货之利，即儒家所谓“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加上清廷本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其在利用汉人的同时，又不能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给清代海疆政策蒙上了一层保守的色彩，对海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开发十分不利。

王朝“克星”祸起东南

毫无疑问，在西方殖民主义横行世界的年代，清朝保守的海疆政策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外敌的入侵，但同时也导致跟外部世界的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皇帝的失策，因为中央王朝面对的对手，已不是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而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势正盛的新兴资本主义各国。他们咄咄逼人的联合进攻，使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咽下苦果。

应该指出的是，康熙亲政以后，对西方科学曾十分钦慕，清廷对传教士和外商的政策也相当宽容。台湾清归后，清朝又主动开海贸易，并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当时的清王朝都不可能摒弃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制度，接受某些资本主义的改革。所以，康熙帝晚年转向保守防范，既是千百年中国传统观念约束下的必然反应，亦是外力压迫的自然结果。“康雍乾盛世”的百余年间，尽管海上的外来势力对清统治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敏锐的康熙、雍正帝已预感到，王朝的克星将要升起，乾、嘉两朝虽不断加强东南海疆的防范，但无可奈何花落去。

（摘编自2017年8月14日《中国经营报》）

考虑和分析，认为这三个喜好的确不值得提倡，于是都愿意站到右边牌下，当地民风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断自省

《臣轨·至忠章》中说：“见善行之如不及，见贤举之如不逮。”这段话旨在强调官员看见美好事物，做了犹恐不够；发现贤才，举荐犹恐不到位。儒家思想强调的自省精神是这两种行为的基础，在反躬自省和比照贤人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日日更新，从而实现忠诚为国的目标。

首先，居功不自傲，反而不断自省。与朱元璋有“布衣兄弟”之交的徐达，帐中能谋，帐外能战，帮助朱元璋立下赫赫军功。然而军功显赫的徐达在处于隆誉之时，仍反躬自省，愈加谦虚谨慎，不仅实现了兼济天下的目标，而且还使得自己能够在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每次征伐回朝，徐达“还辄上将印”，上交将印，以忠示国。朱元璋“赐休沐”“宴见欢饮”，徐达“愈恭慎”。朱元璋授予开国元勋“免死铁券”，其中授予徐达的“免死铁券”上面写有258个字，这段文字中不仅高度评价了徐达的军事武功，而且将一种封建社会中皇帝极高的评价给予了徐达。面对圣恩隆誉，如果不去自省，最终会因膨胀而不免陷于免死狗烹的历史

怪圈。徐达能够不断反省，面对每一次奖赏夸赞，反而更加谦虚，更加不敢接受，既是其韬略使然，也是一种对国家责任不敢掉以轻心的使命使然。朱元璋对徐达非常赏识，经常有人说徐达“不矜不伐”“中正无瑕，昭明乎日月”。徐达也实现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去世后的徐达亦享受各种荣耀：“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其次，在自省中发展出胸怀。古代社会中有一批循吏，他们有思想、有能力、有担当，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具有自省精神带来的清醒、谦虚、礼让。从表面上看，他们所言所行不符合“常规”，实际上却反映了自身大胸怀、大视野的人生格局。东汉名臣杜诗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少有才能”“举政允异”的杜诗在担任南阳太守之后，“节俭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为当地百姓所称赞。但是他居功不傲，没有因为自己作出了业绩就去邀功请赏，反而能够不断地静心自省，向皇帝陈辞：“自以无劳，不安久居大郡。”生怕自己耽误了国家大事、毁掉国家对自己的信任。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杜诗说：“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间，超受大恩，牧养不称，奉职无效，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恨，诚惶诚恐。”在自省的基础上，杜诗提出了“愿退大郡，受小职”的政治期望。这份情真意切的陈辞，饱含着对国家的忠诚，同时也显现出他的人生格局。

史 镜

（上接1版）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北大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坚持“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理念，持续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构建能够充分激发学生潜能与创造力、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流人才。

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突破发展瓶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高等教育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一部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内外环境、供求关系、资源条件、评价标准都已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具体到北大而言，党和国家、人民期待北大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能培养更多的一流人才，产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思想、知识和技术。

经过过去的发展，今天的北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北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突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北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以教育、学科、人事、治理体系、资源配置五大领域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聚焦核心使命、调整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

置，解决影响学校长远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自觉融入党和国家的发展全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牢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创造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他在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战略等七大战略，都离不开科技创新，也都离不开高等院校的参与。因此，北大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北大将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还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北大有41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名单，反映出北大文理医工均衡发展，学科体系完备。这些年北大还培育了一批非常有前景的应用与前沿交叉学科，这些都将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生长点和创新源。北大将紧抓“双一流”建设契机，聚焦世界科技发展最前沿，营造宽松学术氛围，打造更多的一流科研团队，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主动融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大的碳基纳米电子、稀土功能材料与磁性金属配合物、创新药物研发、新能源材料等重大科研项目都要布局在北京，为首都作贡献。积极投身怀柔科学城建设，搞好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大科学装置平台建设，创造出一批标志性的、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